

從理性選擇理論評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結果

史超宇 陳建新

[摘要] 澳門特區有序地完成了第七屆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低投票率和白票廢票數量增加都引來了社會關注，加上選前有五組非建制派候選人被取消資格，新一屆澳門立法會的代表性和監察力也受到社會的一定質疑。本研究主要使用理性選擇理論模型去分析此次選舉結果：首先解釋了本屆立法會直選投票率較低是受到選民預期成本和期待效應的影響，並且聯繫香港區議會選舉來對比分析，對高投票率選舉的意義進行了一定的反思；接着發現白票和廢票沒有存在突出數量問題，將選民投白票和廢票歸因鐘擺效應，從而發現白票和廢票或受到鄰近地區謠言所影響；最後通過回顧第六屆澳門立法會議員的質詢紀錄和《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回應了對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結果的代表性和監察力的質疑。整體上，本研究發現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體現了選舉的公平和選民意向的集中。

[關鍵詞] 澳門立法會選舉 香港區議會選舉 投票率 理性選擇理論

澳門特區回歸後，實行行政主導下行政、立法、司法相互配合和制約的憲政模式，行政主導更是重中之重。在立法與行政的關係中，行政長官擁有較高的法律地位，廣泛且重要的職權，並且在政治體制中有較大的決策權，在特別行政區中行政長官扮演主要的角色，^①以發揮政府的效能。立法權歸立法會所有，澳門立法會依法享有辯論質詢權、提起彈劾權、審核批准權，立法權是一種反映和代表民意的政治權力。^②於代議民主政治制度下，代表民意的公共機構對事關全域的重大事項和具有政策導向的政府行為進行審議，在經過論證或辯論後以票決的方式作出批准或授權的決定。民選產生的議會及其議員，除了行使立法權之外，還要體現行政向議會負責，並接受其監督的這一憲制思想和法治精神。澳門特區是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也擁有代議民主制的決策程序。^③立法會議員與其他利益代表管道，如行政系統內作為諮詢組織的成員相比，其擁有的政治力量最大。因此，議員所具有的角色、力量、民意代表性等，注定了其與利益代表的本質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④

作者簡介：史超宇，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傳播系博士生；陳建新，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府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①蕭蔚雲主編：《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澳門：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2005年，第142頁。

^②王禹：《澳門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功能和使命探討》，《“一國兩制”研究》（澳門）2016年第4期。

^③蕭蔚雲：《論澳門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6頁。

^④蔡永君、何偉鴻、陳建新：《澳門立法會議員利益表達與公共政策參與的探析——一個書面質詢的視覺》，《公共政策與管理評論》（北京）2013年第4期。

直選、間選和委任三部分議員組成了澳門立法會，回歸以來，澳門立法會進行了六次選舉，直選和間選議席幾乎在每屆立法會選舉中都不斷增加，到了2013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之時，議員總數增加至33名，即14名直選、12名間選、7名澳門特首委任，議席分配的格局和數量延續至今。2021年第七屆澳門立法會（2021至2025年）同樣由33名議員組成，直接選舉產生議員14名，間接選舉產生議員12名，選舉結束15天內，由行政長官委任的議共有7名。回歸以來，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改革的總體模式和機制是原來制度的延續和優化：增加直間選的的議席數目，完善組別的劃分和提高代表性，改革趨勢是鼓勵和支持華人精英的參與。直選議席的增加有效地刺激了不同社會群體參與直接選舉的積極性，擴大了選民的影響力。

雖然直選產生的議席不過半，但因是市民直接參與，所以一直為本地媒體與市民所關注，^①澳門立法會直選被學者形容為三種選舉形勢：第一，傳統社團通過人海戰術來保勢；第二，新興富商派以財造勢；第三，民主民生派標榜爭取“理性”選民的支持。^②過往研究澳門立法會直選的文章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向：第一是通過分析選舉結果來評價和預測澳門的政治生態，在這個方向中通常集中於三個方面：一是投票、二是政治版圖／社團、三是候選人本身／參選力量。部分學者同時涉及三個方面，如陳麗君對第四屆（2009年）^③和第五屆（2013年）^④立法會選舉結果的分析，提到投票率、政治版圖（富商派大勝）、賄選問題；庄真真對第五屆（2013年）立法會選舉的分析中同樣提及投票率、政治版圖（民主派失守）。^⑤也有學者討論其中一個或兩個方面，如婁勝華對第六屆（2017）立法會直選的分析中涉及參選力量和政治版圖；^⑥蔡永君和陳建新使用理性選擇理論框架對區域得票進行宏觀解釋和預測；^⑦又如在投票和參選力量中，陳懷林和李小勤在對第六屆立法會直選結果的分析中主要考量新媒體（Facebook）的使用對候選人選情的影響。^⑧第二個研究方向是對立法會職能和選舉制度的探討，這個方向的論文又可劃分為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結合澳門的政治體制進行探討，第二方面是結合議員的書面質詢等討論選舉本身，第三方面則是參考香港地區，對兩個地區的立法會和政制等進行比較。第一方面的文章多見於婁勝華對澳門社團和選舉制度的研究，2010年其對澳門選舉制度的變革及特徵分析中提到了路徑依賴理論框架；^⑨值得一提的是，受制於《澳門基本法》和澳門行政主導體制的考慮，

^①陳懷林、李小勤：《新媒體衝擊波下的澳門立法會選舉：資料與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

^②蔡永君：《轉型時期的澳門政治精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06年，第25—26頁。

^③陳麗君：《第四屆立法會選舉後的澳門政治生態分析》，《港澳研究》（北京）2005年第2輯。

^④陳麗君：《澳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述評》，《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武漢）2005年第2期。

^⑤庄真真：《2013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反思與建議》，《當代港澳研究》（廣州）2014年第1輯。

^⑥婁勝華：《競爭激烈、新老交替與力量均衡——澳門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活動及其結果分析》，《港澳研究》（北京）2017年第4期。

^⑦蔡永君、陳建新：《港澳特區地區選舉投票率分析——基於區域社經背景的視角》，《港澳研究》（北京）2016年第3期。

^⑧陳懷林、李小勤：《新媒體衝擊波下的澳門立法會選舉：資料與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

^⑨婁勝華：《混合與過渡：澳門選舉制度的變革及特徵分析》，《社會科學》（上海）2010年第3期，第78—85頁。

研究這部分問題的學者聲音多集中在爭取更多直選議席，減少官委議席上。第二方面的文章以蔡永君等對直選議員書面質詢的研究居多。^①其意圖通過對議員書面質詢的分析對特區政府公共政策研究和制定的方向有更宏觀的把握和預測。第三方面與香港地區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章中，多為法律學者從法條角度討論港澳兩地《基本法》規定的不同，從而導致立法機關的產生方式和構成結構的不同。^②

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參與直接選舉的 14 個候選組別中，有 7 個組別的候選人順利當選，不少組別取得兩個議席，“澳門民聯協進會”創下取得三個議席的好成績；落敗的 7 個直選組別（合共）只得 8,568 票，總得票率不足 6.5%。2021 年 9 月 12 日選舉當日結束投票後 5 個小時，直接選舉完成點算後，在 137,279 張選票中，有效票為 132,056 張、空白票和廢票的票數為 3,141 張和 2,082 張。投票率為 42.38%，相較 2017 年第六屆澳門立法會選舉下跌了 14.84%。整體來說，是次立法會選舉有不少地方引來社會關注：低投票率，空白票和廢票比例增多，對新一屆立法會代表性和監察力的質疑。本文借鑑蔡永君和陳建新在對 2013 年立法會選舉投票進行分析時使用的理性選擇理論，同樣聚焦於投票率，嘗試回應上述幾個引起社會關注的問題。

一、理性選擇理論

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起源於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時是經濟學家應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作為基礎，將經濟學中基本的“理性人”假設（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引入對政治行為的實證分析，在經濟學和政治學之間建立了一種統一性。^③在諸多關於投票率與選舉結果的原因研究中，“理性選擇理論”模型都被廣泛地使用，根據理性選擇理論模型，在選舉投票中選民的行為被認為同時取決於預期成本和參與投票的期望效應（預期效用—預期成本＝抉擇的關鍵）。預期成本包括選民參與投票消耗的時問、金錢和其他資源；同時，選民在每次投票都要考慮選票可能帶來的預期效用，例如對政策的影響。^④在這個問題中存在着兩個變量的博弈：一方面是與個體利益或公共利益相關的投票參與，另一方面是這種投票參與可能帶來的時間成本和交通成本。^⑤20 世紀中期，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經濟理論》、^⑥布坎南與塔洛克（James M.

^① 蔡永君、何偉鴻、陳建新：《澳門立法會議員利益表達與公共政策參與的探析——一個書面質詢的視覺》，《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北京）2013 年第 4 期。

^② 王禹：《澳門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功能和使命探討》，《“一國兩制”研究》（澳門）2016 年第 4 期。

^③ [美] 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民主的經濟理論》，姚洋、邢予青、賴平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6 頁。

^④ 蔡永君、陳建新：《港澳特區地區選舉投票率分析——基於區域社經背景的視角》，《港澳研究》（北京）2016 年第 3 期。

^⑤ 周架峰：《“投票悖論”的分析及其矯正——理性選擇理論的“投票現象”應用批判》，《長春理工大學學報》（長春）2010 年第 6 期。

^⑥ A.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合著的《同意的計算》和^①奧爾森 (Mancur Olson) 的《集體行動的邏輯》，^②這三部著作的出版標誌着政治學研究的“經濟學路徑”的確立。

在以選舉為主題的當代西方代議制民主中，選民的投票率整體處於下滑趨勢。安東尼·唐斯根據理性理論模型對此現象作出解釋，認為由於理性的選民選擇系統地依賴特定的信息來源，信息成本的存在導致選民知情程度的差別，並由此導致政治權力實際分配的不平衡，其中導致的一個後果就是影響選民是否投票；投票成本的存在，使得一部分選民選擇棄權。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反向論證了唐斯的觀點，^③福山認為選民的投票決定，主要的考慮不是預期效用，而是避免自己最害怕的結果出現，或者可以看成把最害怕的結果出現的機會降到最低的原則。實際上，兩位學者基本上是從預期成本和預期效用兩方面合力解釋了低投票率，回溯了理性選擇理論模型。

本研究嘗試使用理性選擇理論模型，從以下三部分來回應前言部分提出的問題，分別是：投票率與選舉意義、廢票白票比例，以及本屆澳門立法會的監察力。

二、投票率與選舉意義

澳門回歸後立法會選舉投票率較高的年份分別是 2005 年（第三屆澳門立法會選舉）58.4%、2009 年（第四屆澳門立法會選舉）59.9%、2017 年（第六屆澳門立法會選舉）57.2%（表 1）。Goldfarb 和 Sigelma 在一篇關於理性選擇的投票理論的文獻綜述中提出，在簡單理性的假定下，“公民責任”、“利他”等動機都能被融入理性選擇的投票模型中。^④2005 年特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廉政公署接獲賄選舉報 423 宗，較 2001 年大幅上升，^⑤立案調查的合共 12 宗，截至 2005 年底完成偵查且移送監察院的有 6 宗。投票率最高峰是 2009 年立法會選舉，當時澳門特區政府面對兩大挑戰——歐文龍貪污案件和美國金融海嘯。歐文龍貪污案調查始於 2005 年，根據香港廉政公署情報，調查一宗貪污案件時，發現時任運輸工務司司長的歐文龍涉嫌濫用職權，收受建築商人賄款，指定建築商於特區政府的大型建造工程項目中標，歐文龍貪污案件當時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這一事件導致 2007 年 5 月由澳門六個社團組織的大規模示威，參加遊行的一萬多人中，甚至包括個別立法會議員和少量公務員；另一方面，2008 年的美國國金融海嘯也給澳門經濟帶來一定

^① 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②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③ [美]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誠信：社會德性與繁榮的創造》，李宛蓉譯，台北：立緒文化，1998。

^④ A.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⑤ 婁勝華：《建章立制與銜接漸進：回歸後澳門選舉制度的發展》，《行政》（澳門）2010 年總第 86 期。

的衝擊，特區政府也提出確保民生和就業保障來應對金融海嘯帶來的衝擊，^①這一屆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攀升至回歸後高峰。2017年第六屆澳門立法會直選投票率為57%，較2013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上升兩個百分點，但不得不提的是在2017年澳門立法會選舉前兩星期，天鴿風災意外地重創澳門，造成10人死亡，超過200人受傷，經濟損失超過100億澳門元，全市大範圍停水、停電，駐澳解放軍協助救災，特區政府治水救災不力飽受批評；^②風災過後特區政府的問責成為一個大的話題，一般而言，發生重大損傷政府威信事件後，建制派的選情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一些較為熟悉澳門政治的學者在選前分析，在澳門建制派也有質詢政府的慣例，風災過後，溫和的中間派可能比民主派在選舉中更為有利。^③確實，從直選投票結果來看，民主派並沒有因為“天鴿”風災而得到更多議席，^④而在風災期間，資源充裕的傳統親中社團則展現了強大的動員能力，積極參與救災、派發物資等行動，贏得不少選民的選票。

表1 澳門特區立法會直接選舉選民投票情況（2001—2021）

| 年份 | 選民總數（人） | 投票選民（人） | 比例（%） |
|------|---------|---------|--------------|
| 2001 | 159,813 | 83,644 | 52.34 |
| 2005 | 220,653 | 128,830 | 58.39 |
| 2009 | 248,708 | 149,006 | 59.91 |
| 2013 | 276,034 | 151,881 | 55.02 |
| 2017 | 305,615 | 174,872 | 57.22 |
| 2021 | 325,180 | 137,279 | 42.38 |

資料來源：根據立法會選舉網站資料整理。

根據唐斯的觀點，選民獲得政治信息是為了兩個目的：一是幫助他們作出關於投票的決策，二是構成可以影響政府政策的輿論。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在抗疫的大環境下如常舉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澳門本地感染比例較低，根據2020年民意調查研究學會網絡新冠肺調查，顯示受訪的澳門居民中近九成滿意特區政府此次疫情的應對表現。^⑤同時，在是次立法會選舉前一個星期，中央政府於9月5日出台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意味着澳門需要融入國家大局和在灣區經濟發展上進行提速，這種基調也更強調新一屆立法會成員需要對國情更為熟悉，並不只是針對澳門的狀況進行監察。從預期

^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陳麗敏：政府確保民生及就業得到保障》，2009年6月20日，<https://www.gov.mo/zh-hant/news/74992/>。

^②《澳門“天鴿”颱風災害評估總結及優化澳門應急管理體制建議》報告，2018年，<https://www.dsepr.gov.mo/uploads/attachment/2020-05/827cd17ec92228c657ec185036a29c90.pdf>。

^③《澳門立法會選舉：你不知道的五個重點》，2017年9月8日，BBC，<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1158243>。

^④沈敏路：《澳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結果分析》，《智富時代》（廣州）2018年第11期。

^⑤《民意調查研究學會網絡新冠肺調查 居民防疫意識強滿意政府應對表現》，2020年2月11日，易研方案，<http://www.e-research-solutions.com/news/post/5e61ec5a94849e0015132017>。

效用來看，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和深合區方案的出台，使居民對此次立法會直接選舉的預期主要放在未來特區政府的施政如何配合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和灣區發展大局上，傳統建制派議員足以扮演此角色，一定程度上會降低選民參與選舉的意願；從預期成本來看，選舉當天下午的暴雨，染上新冠肺炎的風險（長者及長期病患者都是有較高風險，而他們的投票意願也是較高的），出門投票的交通成本（一般而言，低收入人群中的棄權率高於高收入人群），以及旅居於外地的澳門居民因疫情原因而未能回澳投票，種種因素交織都影響了投票率。以理性選擇理論模型作為理論基礎，綜合上述觀點，不難推論出是次澳門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偏低的主因。

另一方面，立法會機關的選舉本質上是要讓政府正常運作，為人民服務，並不只是盲目追求“廣泛代表性”。2019年香港正處於反修例和社會運動的籠罩之下，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關於“特區政府及特首民望意見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市民對於特區政府表現的滿意程度在不斷降低，到了12月份對特區政府表示不滿意的比率升至69.6%，同年香港區議會選舉，選民參選率和投票率創歷史新高，根據2019年區議會選舉網頁資料顯示，2019年正式登記選民人數共4,132,977人，而是次區議會選舉中累積投票人數達到2,943,842人，即累積投票率高達71.2%，較上一屆區議會選舉投票率（47.0%）高出24個百分點，升幅巨大，成為歷屆之最。區議會選舉共產生了479個議席，除去27個直接當選議員的議席之外，在香港18個分區，以單票制選舉出來452個議席，反對派取得388個議席。^①較高的投票率並不意味着議員的能力和議會的代表性較高，J·S·密爾（John Stuart Mill）認為代議制民主容易產生兩種危險，其中一種是同一階級的人構成的多數實行階級立法的危險。“民主在為其本身提供本分工作——監督和制約，所必要的智力條件方面有足夠多的事情要做。如何形成和保證這種治理條件，是在評價代議制團體的特有構成時必須考慮的問題”。^②

三、廢票白票比例與鐘擺效應

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認為儘管個人有多種方式參與公共事務，然而現代民主的核心政治制度是選舉和投票。選舉投票不僅是公民權利的實現形式，而且成為賦予政府合法性的最終來源。^③不過，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干擾，選民往往很難計量成本和預期收益。選舉鐘擺效應（pendulum effect）主要是來自心理學，這個概念是用來描述選民情緒的擺蕩現象，並且可以用來描述選民的非理性投票行為，指當某陣營於選舉中大勝後，大

^①曹琬茜：《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及其對香港政治生態影響分析》，《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廣州）2020年第2期。

^②[英] J·S·密爾（John Stuart Mill）：《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86頁。

^③[美]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李增剛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8頁。

敗的陣營容易在下一次選舉收復失地，這一情況就如鐘擺向左擺後便會向右，主要是出於人民不希望一黨持續獨大的體現。^①澳門雖不存在政黨政治，但在澳門立法會選舉中同樣存在“鐘擺效應”，2014年澳門爆發反對《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的“反離補”運動，民主派蘇嘉豪在這次抗議運動中展露頭角，三年後選戰澳門立法會成功，成為澳門立法會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從這個角度來看，是次立法會選舉前大規模“民主派”候選人被取消資格（Disqualification, DQ）後，有部分選民以投廢票和白票方式來表達對DQ事件的不滿，從而得出較多空格票或廢票的情況便不難以理解了。其實，本屆選舉空白票和廢票總數量處於回歸以來立法會選舉的第三位（第一位為2009年的7,209張，第二位為2013年的5,363張，第三位才是2021年的5,223張），而單就廢票數量而言，2021年只是歷屆數量的第五位，相反本屆的空白票數量才是歷屆之最（表2），但是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假設真的有投票者希望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應該以廢票來表達，還有這次投廢票的人是有付出時間的，實際上，廢票數量只是歷屆倒數第二低，因此結合前文所述的原因，似是跟澳門居民對特區政府不滿的關係不大。但是隨着澳門人口老齡化，不排除有部分投票者（特別是年長人士）未能有效投票而放棄，從而增加了白票數量，傳統社團在本屆都取得不錯表現，而傳統社團的支持者都不乏年長人士或弱勢人士，因此特區政府應該檢視選舉過程會否對年長人士或弱勢人士帶來不便。

表 2 澳門特區立法會直接選舉空白票和廢票（2001—2021）

| 年份 | 空白票（人） | 比例（%） | 廢票（人） | 比例（%） |
|------|--------|-------------|-------|-------------|
| 2001 | 550 | 0.66 | 2,116 | 2.53 |
| 2005 | 660 | 0.51 | 3,272 | 2.54 |
| 2009 | 711 | 0.48 | 6,498 | 4.36 |
| 2013 | 1,083 | 0.71 | 4,280 | 2.82 |
| 2017 | 944 | 0.54 | 1,300 | 0.74 |
| 2021 | 3,141 | 2.29 | 2,082 | 1.52 |

資料來源：根據立法會選舉網站資料整理。

選舉的理性模型前題是理性選民假設，認為選民的行為同時取決於預期成本和參與投票的期望效應；但公共輿論表明大多數人都不擅長對政治問題進行抽象的、具有完整邏輯性的思考，^②現實的建構和傳播的方式會影響民眾對社會運動的看法，從而影響參與運動的人的態度和策略選擇，並且限制當權者的應對手法。因此，參與社運的人和當權者都會

^① 庄真真：《2013 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反思與建議》，《當代港澳研究》（廣州）2014 年第 1 輯。

^② [美] 蘭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新聞·幻象的政治》，楊曉紅、王家全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98 頁。

着力傳播對自己有利的訊息和宣傳對自己現實的有利詮釋，甚至利用假新聞和謠言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①干擾公眾對預期效用的判斷，進而影響選舉結果。回顧 2019 年的香港社會運動充滿着不少謠言和虛假新聞，從而推高香港區議會當時選情。實際上，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在每次遇到重大社會事件都會伴隨其後選舉投票率的拔高：2003 年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大規模遊行示威之後，次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為 55.6%；2014 年的雨傘運動後，2016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為 58.3%。而從過往政治實踐看，澳門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或多或少地受到周邊尤其是港台政治的影響，2014 年澳門的“反離補運動”就是在台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激進街頭運動的影響下發動的。^②

四、新一屆澳門立法會的監察力

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前一個月民主派候選人被取消資格，使外界對本屆立法會的監察力存在不少質疑。其實，一方面政治和經濟行為中包含着不確定性，對付不確定性是幾乎每一項社會制度中的重要內容，根據唐斯的觀點，只要不確定性減少了，引進並保持了穩定的秩序，理性便是存在的，理性行為需要可預測的社會秩序。澳門立法會的運作和產生基礎作為一種地方性民主，需要在堅持“一國兩制”大方向，以及擁護《澳門基本法》的前提下，形成對政府的適度監督狀態。如果將本屆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員的當選組別按照慣常的政治力量劃分，可以分為四個大類：一、傳統社團共取得 6 席（同心協進會、群力促進會、美好家園聯盟）；二、商界鄉族取得 5 席（澳粵同盟、澳門民聯協進會）；三、土生及公務員力量取得 2 席（新希望）；四、中間專業人士取得 1 席（傳新力量）。整體分佈比例均衡，熟悉粵澳事務人士成為立法會的主要組成部份，可以做到有效監察特區政府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工作。再者，澳門立法會素來有建制派質詢政府的傳統，根據統計資料，除商界代表梁安琪之外，第六屆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員大部分議員的發言和質詢紀錄數量大致類似，在質詢議題的種類上基本是受到社團身份影響，無建制或非建制影響（表 3）。

^①陳韜文、李立峯：《再國族化、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角力：香港的傳媒和政治》，《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2007 年總第 101 期。

^②婁勝華：《競爭激烈、新老交替與力量均衡——澳門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活動及其結果分析》，《港澳研究》（北京）2017 年第 4 期。

表3 第六屆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員發言和質詢紀錄

| 年份 | 議員姓名 | 議程前發言 | 書面質詢 | 口頭質詢 |
|-------|------|-------|------|------|
| 傳統社團 | 何潤生 | 62 | 196 | 20 |
| | 黃潔貞 | 60 | 196 | 19 |
| | 李靜儀 | 63 | 166 | 19 |
| | 梁孫旭 | 63 | 182 | 19 |
| 鄉族團體 | 施家倫 | 49 | 198 | 17 |
| | 宋碧琪 | 56 | 148 | 17 |
| | 麥瑞權 | 58 | 197 | 18 |
| | 鄭安庭 | 60 | 167 | 19 |
| 商界或專業 | 梁安琪 | 52 | 16 | 12 |
| | 林玉鳳 | 61 | 190 | 19 |
| 民主民生派 | 高天賜 | 52 | 187 | 15 |
| | 吳國昌 | 53 | 193 | 19 |
| | 區錦新 | 63 | 178 | 19 |
| | 蘇嘉豪 | 52 | 167 | 15 |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活動報告》，第六屆立法會第一／二／三／四會期（2017—2021）。

另一方面，在民主政體下，選民除了借助投票表達訴求外，還可以通過利益集團、社會運動等多種形式追求既定目的。就政治參與而言，作為有效的政治行為，選舉權並不實用。^①立法機關的選舉本質上是由選民選舉自己的代表，衡量選舉制度的一個重要指標是代表性的體現，澳門立法會的使命和功能也是包括兩類：一是民意代表選拔機制；二是居民民主參與途徑。放之澳門社會，居民的民主參與比民意選拔更充分地體現在立法會的選舉當中，其串聯着居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體驗。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假說是關於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之間關係的經驗研究檢驗的一個基本假設：經濟繁榮促進政治民主。經濟學家羅伯特·J·巴羅（Robert J. Barro）對此進行了計量經濟學的檢驗，得到的結論之一是，在經濟發展早期階段，人民更傾向於關注基本的經濟福利——物質生活水平、就業等等，而不是政治權利，如投票。^②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本屆立法會的選舉結果符合當下澳門居民的基本利益訴求。

^① [美] 茱迪·史珂拉（Judith N. Shklar）：《美國公民權：尋求接納》，劉滿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頁。

^② [美] 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民主的經濟理論》，姚洋、邢予青、賴平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頁。

五、總結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模型，一方面，筆者認為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低投票率主要是受到預期效應和預期成本兩方面因素的影響：疫情的發展和深合區方案的出台使得選民將預期重點放在未來政府的工作上，而非希望透過選舉給政府施加壓力；天氣、交通、疫情則使得選民不願投入更多的成本參與投票。參考香港的區議會選舉，高投票率選舉的意義受到質疑。

另一方面，在對空白票和廢票的統計分析中，筆者同樣認為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其實相較往屆並無太多特別之處，反而在空白票增多下，特區政府應該檢視投票過程會否影響弱勢人士投票。反而廢票數量卻是歷屆倒數第二低，或可以間接證明DQ事件未必如坊間所言般具影響力。

此外，本研究同樣嘗試回應了DQ對本屆立法會監察力的影響，根據對第六屆立法會直選議員的質詢紀錄的回顧，筆者認為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結果不存在代表性較差以致影響立法會監察力的問題，今屆立法會和特區政府都需要把工作重心放於澳門跟灣區的合作和互動，筆者相信以較熟悉國情的立法會議員去監察特區政府可以更有成效。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澳門立法會始終是單一政體下的地方立法機構，無論是立法會選舉本身，還是選舉出的議員都需要秉持愛國愛澳的基本信念。澳門特區政府回歸以來，傳統建制力量在愛國愛澳，探索澳人治澳的道路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再者，從剛出台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年）》來看，澳門也必須要融入國家和灣區的發展大局，相信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結果將有利於澳門未來的民主政治和經濟社會的發展。

[責任編輯 陳超敏]